

方言与音韵论集



李如龙 著



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文化研究所
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

PDG

本书承新加坡李氏基金会赞助排印，谨致谢忱！

序

詹伯慧

我和如龙同志相交逾30年了，犹记1963年一批方言学界的“道友”应邀聚会鹭江讨论那迄今仍未正式出版的《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并借此机会纵论有关方言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分区问题之际，如龙作为会议的主要召集人，当时是厦门大学的年青教师，还是个二十来岁的青年小伙子，但是，他在讨论会上发表的许多言论，特别是他在谈及福建方言情况时，那种了如指掌的风度，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业务根底深厚，他的田野经验丰富，已经令人深信不疑了。那时候论资排辈还是天经地义的事，在大家的心目中，如龙同志可算是方言沃土上辛勤耕耘的“年青老农”了。会议期间同志们拍照留念，有人建议按年岁次序排列成行，如龙果然排列了最后，数下来正是“老九”。“老大”是中山大学的黄家敬同志。而我，虽然比“老大”少了十岁，却也忝列“老三”。真没料到，这么一张不经意的照片，竟让方言学的红线把九个人的学术情谊紧紧拴住，以至于在日后漫长的岁月里，甚至在各自坎坷的人生旅程中，鹭江之会的弟兄情谊能够经久不衰，传为语坛佳话。岁月无情，如今回首一顾，九弟兄中除了英年早逝的“老六”施文涛外，“老大”早已越过古稀之年，而如龙这“龙尾”，转瞬也将步入花甲之列了。所幸历尽风吹雨打，磋砣岁月中大家仍矢志不移，对方言之学一往情深，死抱着这块“沃土”不放。30年后再聚首，除了每人头上平添几丝华发之外，多少都还能拿出一一点研究成果来作为见面礼。如龙虽是“小弟弟”，见面礼却是特别丰硕，格外引人注目。且不说那经常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遒遒高论，光就成书的专著，如《闽语研究》、《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地名与语言学论集》、《福州方言词典》等，也够说明他的卓越成就了。

从50年代负笈厦大时起，如龙同志就一头栽到方言学中。几十年来他在方言学的广阔天地中自由驰骋，并不是东打一枪、西放一炮，而是胸有成竹，深谋远虑的。从他发表的著述可以看出，他的学术战略是步步拓展，步步深入的。他先是抓住身边的方言宝藏不放，从福建方言的实地调查做起。正如他在本书的前言中所说：“我研究方言是从母语——闽南话入手的”（见《前言》）。年青时代他就和厦大的师友们一起，和省内的同志们一起，一个县一个县，一个点一个点地记录福建省内多采多姿的方言，1963年鹭江会议上印出来讨论的那100多万字《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是众多福建同道的集体创作，其中如龙同志也就是主力之一。打那以后，他不断酝酿着、思考着如何在已有的基础上把福建方言的调查研究步步深入下去，使福建闽语、客语以至其他方言的面貌能更全面、更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为此，他反复深入田野，实地考察，搜集了一批又一批的第一手的语料，并着手从比较的角度进行综合研究。1983年和1985年先后两次在《中国语言学报》上发表《论闽方言的一致性》和《论闽方言内部的主要差异》两篇很有分量，很有见解的论文，正

是他和陈章太同志(“九弟兄”中排行“老四”)长期合作对闽语从微观到宏观,从分体到总体的研究成果。这两篇文章在闽语的研究史上,无疑是占有重要地位的扛鼎之作,说它是闽语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突破,我想是不过份的。近十多年来,如龙同志不断着力于发掘、阐发福建省内诸方言的特点,在专题研究方面下大力气。他写了一些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某些方言现象的专论,还把触角伸向福建省内一些鲜为人知的方言点,在发掘深藏民间的方言资源上下功夫。他的目光并不停留在方言语音方面,而是充分重视从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对方言进行全方位的探测,对方言词汇的调查研究独具匠心,早在80年代初期,就写过论汉语方言词汇差异的文章(发表在《语文研究》1982.2期),比较详尽地论述了方言词汇的各种差异。后来我们合作编写的大学文科教材《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一书中,《汉语方言词汇调查》、《汉语方言论著的编写》两章和另外两章的语音和词汇语法调查表,就都是他执笔的。如龙同志还特别注意闽方言区域内的“方言岛”现象和他所谓的“混合方言”现象,经他调查整理成文的“方言岛”音系除位于福建省内的如澳腰莆田方言岛外,还有同属闽语区的海南岛闽方言“包围”中的“迈话”。如龙同志论及的一些方言现象,有的本是前人也曾注意到的(如闽语的文白异读问题),但到了他的手里,老问题却往往引发出新的境界来。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作深入的探讨,其结果也就常常是不乏新意,后出转精了。

如龙同志工作刻苦,作风踏实。在他的身上,经常可以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敬业精神,一种充满着毅力和意志的精神。正是这种可贵的精神,使他总是洋溢着活力,总是盘算着在方言研究中如何打开新的局面,开拓新的领域。他对待学术问题一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接触到不同寻常的语言现象,总爱在脑子里打几个问号,想一想这是怎么回事。寻根究底对他来说已是做学问的习惯,而联系、结合、考证、比较等等更是他经常思考的内容。他有扎实的音韵学功底,使他的方言研究能够和音韵研究密切结合起来,既可以从方言到音韵,又可以从音韵到方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方言学和音韵学是可以相互为用,相互发明,相得益彰的”(本书《前言》)。正因为他能很好地把音韵学和方言学结合起来研究,对于方言中出现的许多特殊现象,也就有可能深入到历史发展的层面上来探讨,写出来的文章自然会有一定的深度。如龙同志不但重视方言与音韵的结合研究,还进一步把方言研究的视野拓展到不同方言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及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比较研究上来。他对闽南话和客家话关系的论述,对闽方言和吴语关系的探讨,以及对闽方言和台语关系的探索等,都用了许多的功夫,写出了一些颇有说服力的论文来。比较研究对于进一步推动汉语方言学乃至整个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普通语言学,无疑都是非常重要的,但难度也确实不小,如龙同志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实在并不夸张。正因为这是难度极大而又极有意义的工作,如龙同志敢以闯难关的勇气和毅力去碰硬,其精神自然深受方言学界同人的赞赏。三十多年来,如龙同志从自己掌握的大量方言事实出发,不断开拓思路,开拓视野,从综合比较上找问题,从历史发展上找问题,从理论架构上找问题,这种不拘泥于传统的框框,四处寻找问题,步步拓展领域的研究风气,是值得赞赏,也是值得推广的。

如龙同志的研究工作,并不限于方言学,从这些年来他发表的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以前言研究为轴心，扩散、放射到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文化语言学以至地名语言学等领域中去。他在地名学方面的成就是语言学界所公认的。他在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方面也都发表过许多真知灼见。近十几年来，他又着重于把方言的研究内容从境内扩展到域外，1992年他在香港《中国语文研究》第十期上发表的《闽南方言和印尼语的相互借词》一文，详尽地双向列举了两种语言相互借用的情况，无疑是迄今为止关于闽南方言与印尼语言借词问题最有份量的一篇论文。目前如龙同志又正在组织几位年青研究生开展对东南亚华人社区方言情况的调查研究，这是一个跨越方言学、语用学和文化学几个学科的课题，堪称是方言研究中独辟蹊径的创举，显示出方言研究的天地越来越广阔。

总之，如龙同志是一位在方言研究领域中不断开拓进取，务实求新的学者，一位当之无愧的汉语方言学博士导师。如今他把自己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汇集成书，这自然是件大大的好事，汉语方言学的资料宝库中，又增添了一份财富，是值得庆贺的。值此《论集》付梓之际，作为30多年的老朋友，如龙“老九”要我这个“老三”写几句话，我也就乐于借此机会谈谈我对他的学术生涯的认识。至于这本书的内容，我认为都是扎扎实实的佳作，读者读着本书，自然会得到充分的精神享受，这就用不着我来多费口舌了。

1996年1月于暨南园

前 言

近二十年来,语言学和其他科学一样,迎来了繁荣的春天。我和许多步入中年的同代人一样,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这兴奋来自一种压抑的解脱,也来自一种新增的紧迫感:在研究汉语的队伍里,老一辈专家焕发青春,研究成果优质高产;中年学者担着工作和家庭两副担子,为了立足,还要奋发;青年一代迅速成长,已成咄咄逼人之势;国外的华裔、非华裔学者也以特有的优势参与竞争。就在这场竞争之中,我一面教书,一面注视着学术界,既要重读旧书,又要涉猎新作,还得进行大量的田野调查。想方设法出席那一年几次的境内外的各种学术会议,赶制论文,参加交流,接受检验。有时想起那些年月的情景,斗室之中,日以继夜,暑去寒来,冷暖备尝,连家人都不得安闲,真是感慨万千。十几年过去了,竟也积下 100 多篇各种内容的论文。然而,因为忙,一直未能坐下来作一番检验、思索、甄别和总结。每思及此,不无惆怅。这两年,不少熟悉的年青朋友,或出于学术研究的神交,或上门求学,都催促我编集子,以便琢磨和切磋。我在教学中也深感到应该给年轻人多提供些果实,哪怕鲜甜之中带有酸涩和苦辣,让他们自己去咀嚼、品尝、消化、汲取、扬弃,这样做,想必比许多系统的讲授更加有效。于是动手编了这本集子。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 32 篇论文是关于汉语方言和汉语音韵的主要研究成果。其中 13 篇曾在杂志上刊登过,7 篇已被收进不同的论文集里,其余 12 篇虽未曾发表,多数也在境内外的学术会议上宣读过。编成集子时又细细读了一遍,有的地方作了一些修改。也许有点敝帚自珍吧,自己还觉得有些保存价值的。

这 32 篇文章中,第一组的 6 篇像是讲理论的,其实都是从某种事实引出的结论,有的是给学生讲课之后整理成文的,有的是编写教材时着重探讨过的。《跳出汉字的魔方》一文则是应《中国语文》编辑部之约所作。

第二组的 7 篇是关于闽方言语音的综合研究,无非用闽方言材料来论证音韵问题或用音韵学研究成果来说明方言现象。方言学和音韵学是可以相互为用、相互发明、相得益彰的。在应用方言材料时最好不局限于一种方言而是采用相关的几种方言。这种研究应该说是行之有效的,今后有机会还会继续做下去。

第三组的 10 篇除了一篇是方言岛的记略之外,都是对福建境内的闽方言的专题研究。就论题说,多数也与音韵有关;就规模说,多半是些小题目。对于个别方言的专题研究,自然应该选取那些具有方言特点的课题,除此之外,我还主张,与其大题小作,不如小题大作。大题小作也可能是微言大义,但那样的大手笔恐怕不多,一般的人很容易写成大而空的东西,至少也会使读者不得其详,未能满足。若是小题大作,抓住一个小问题,纵深穷究,多方考察,广泛比较,弄清该语言事实的来龙去脉,从而揭示语言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过程,这样的工作,一定是不会徒劳无功的,下多少功夫,就会有多少收获。

第四组的9篇多是近几年来写的,是就几种方言或语言所作的比较研究。我研究方言是从母语——闽南话入手的,五、六十年代在厦门大学时还调查了闽西的客家方言,70年代到福州工作后则着重于闽北、闽东方言的调查研究。在两次主办全国性方言调查讲习班时接触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的方言,使我知道了更多的方言事实,招收研究生之后,又跟着研究他们所熟悉的客赣方言,于是,我开始做一些方言间的比较研究,当然还只是从我比较熟悉的几种方言着手,主要是做闽、客、赣之间的比较,大田的后路话和海南岛的迈话虽是单点的报告,却隐含着比较,前者是闽方言之间的比较,后者是几种南方方言之间的比较,所以也归在此类。我深知,这种比较研究难度很大,尤其是拿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作比较,更是使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是我也相信,有些方言现象如果局限于本方言点或本方言区的材料作分析,怕是很难得出科学的结论的。就像为风景区照相,不能总是“身在庐山中”,有时还要从此山才能望到那山高,有时还得从飞机上“鸟瞰”才能反映出全貌。方言间的比较研究,汉藏语之间的比较研究,总是要逐步做起来的。事实上,这十几年来,许多先进者已经做了不少成绩。和他们相比,我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许多认识还很肤浅,正确的方法也体会不多,这部分文章尤其需要求正于方家的。

福建真是方言的宝库。我生长在那里,从上大学算起到后来在大学教书经历过40个年头。尽管其间也有好些中断的时候,但是了解方言,思考与方言相关的问题可以说没有间断过。这些文章记录了我了解的过程和思考的结果。除了方言之外,不少牵涉到音韵问题,因此名为《方言与音韵论集》。在研究工作中,我自己是努力用事实来说明问题的,但又不甘心止步于罗列事实。由于自己的学力和眼界还有种种限制,这些成果难免有幼稚之处。不过,幼稚有时也有好处,说话比较大胆,而大胆的话有时也可能有幸而言中。即使所言不中,让后来的人来纠正,也算是一种贡献。近几年来,大概也有年岁的关系,说话是越来越胆小了。数年前在尤溪县的汤川话中发现,明明是闽方言却把非组字和晓匣母合口字读f、v;在浦城县的石陂话又发现,肯定是闽北方言但拥有全套的全浊声母。以前常说的闽方言无轻唇音以及古全浊声母清化,现在都成了问题。看来,要真正理解闽方言着实不易,许多进一步的研究课题还摆在我们面前。本书的文章中若有一得之见可资参考或是一隅之误能引出更高明的宏论,都会使我感到欣慰的。

李如龙

1995年10月

目 录

| | |
|----------------------------------|---------|
| 序 | 詹伯慧 (1) |
| 前言 | (4) |
| 论汉语方言的类型学研究 | (1) |
| 论汉语方言的词汇差异 | (11) |
| 语音的变化是区分汉语方言的重要标准 | (20) |
| 声韵调的演变是互制互动的 | (25) |
| 福建方言声调分化的模式 | (36) |
| 跳出汉字的魔方——四十年来汉语方言研究的重大突破 | (48) |
| 论闽方言的文白异读 | (52) |
| 自闽方言证四等韵无 -i- 说 | (72) |
| 中古全浊声母闽方言今读的分析 | (83) |
| 考求方言词本字的音韵论证——兼评闽方言本字 58 例 | (97) |
| 闽西北方言来母字读 s- 的研究 | (110) |
| 闽方言中的古楚语和古吴语 | (121) |
| 闽方言的韵书 | (127) |
| 闽南方言的双声叠韵 | (141) |
| 闽南方言的“相”与“厮” | (147) |
| 闽南方言的“有”和“无” | (152) |
| 泉州方言“给予”义的动词 | (162) |
| 《八音定诀》的初步研究 | (167) |
| 说“八” | (181) |
| 福州方言本字考 | (184) |

| | |
|----------------------------|-----------|
| 澳腰莆田方言岛记略····· | (206) |
| 建瓯话的声调····· | (218) |
| 松溪政和方言的谐音变读····· | (231) |
| 从词汇看闽南话和客家话的关系····· | (236) |
| 从客家方言的比较看客家的历史····· | (248) |
| 福建大田广平话——一种混合型方言····· | (267) |
| 闽方言与苗、壮、傣、藏诸语言的动词特式重叠····· | (288) |
| 闽南方言和台语的关系词初探····· | (298) |
| 闽粤方言的“阳入对转”派生词····· | (306) |
| 客赣方言的入声韵和入声调····· | (316) |
| 客家方言本字考····· | (333) |
| 海南岛的迈话——一种混合型方言····· | (357) |
| 附录 本书作者语言学著述目录····· | (369) |
| 跋····· | 张双庆 (373) |

论汉语方言的类型学研究

—

以往的汉语方言的研究总是从记录字音、词汇和语料入手。描写方言的语音系统时，拿它和中古音以及现代普通话语音系统作比较，说明方言语音的特点；整理词汇、语法材料时则通常只拿普通话作参照系，说明该方言的词汇系统和语法结构的特点。这种研究对于认识单一的方言的特征是有效的。因为中古音（广韵系统）作为书面语的标准音曾经统治中国文坛一千年，在中古时期，这个语音系统是有代表性的；对于各地方言也确实有过长时期的不同程度的影响。而普通话也是影响最大的最有代表性的现代汉语，拿这两种参照系来考察方言材料，确能对该方言的特点获得相当的认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方言事实的了解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深入了，考察语言现象也增添了各种新的视角和方法，调查研究汉语方言的这套传统模式就逐渐显出了它的缺陷。

首先，中古汉语并非现代各方言的共同的祖语。应该说，汉语的方言多数在汉唐之际就形成了，像湘、赣、吴、闽、粤诸方言都还可以追寻到先秦时代楚、吴、越、南楚等古方言的源流。还应该指出，正像南北方汉人身上都混有其他民族的血统一样，南北的各种方言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也杂有其他原住民族或入主民族的语言成分。因此，中古汉语和现代各方言的关系并非直接的继承关系或单一的延续关系，而是历史上的一种横向的渗透关系：作为书面的共同语，对于各种方言的口语总是要施加着某种影响。其实，广韵系统究竟是不是中古时期共同语的语音系统，至今还有争议。可见，中古音只能作为参照系，帮助人们了解方言语音系统的特点，而不能作为考察方音流变的出发点。

其次，就横向的渗透说，历史上不但有共同语对方言的影响，而且势必还有方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从地理方面说，邻近的方言由于社会生活的接触，甚至通行双方言，方言之间的相互渗透是不可避免的。例如湘方言的北面和西面都是官话，在交通发达的铁路沿线的新湘语已经和官话相差无几，北片吴语和赣语同下江官话相互穿插（例如南通有吴语，九江则有赣语），利用长江密切交往，官话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从历史上说，大多数方言区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过辗转和周折。例如客家先民从中原拔足之后，就经过了长江南北、鄱阳湖周围的栖止和闽西赣南的停留，然后进入岭南的。在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灾荒不断的年代，许多方言区都有过人口锐减、迁逃、外移或别方言区的人大量渗入的历史。湘方言区不但有东部长廊十几个县蜕变为赣方言，连腹心地区的老湘语也含有大量赣语的特征，这就是两宋时期赣人大批入湘的结果。某个方言区的人迁往他处，形成方言

岛,这也是经常可以发现的事实,在包围方言的影响之下,这些方言岛也难免发生变化。可见,由于横向渗透的普遍存在,任何方言都有一定程度的混合性质。纯之又纯的“谱系树”状的方言分化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说某方言是某方言的前身,方言间有堂兄弟、叔侄关系等都是不科学的。可见,透过方言和中古音的比较来说明方言的特点一定有很大的局限性,这是历史比较法的先天缺陷决定的。

由于受到方法论的局限,传统的方言研究着重于音韵学关于音类的分合的比较,对于方言差异也缺乏科学的认识,好像方言只是一些“殊方异语”,一些或多或少的语音、词汇、语法的差异,把方言和方言差异等同起来。关于“汉语方言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的说法一直很有市场。结构主义在西方流行之后,中国学者也运用它来研究汉语,但多半只用来分析普通话,尤其是书面语的语法,似乎方言口语是不适用这种研究方法的。

诚然,方言和共同语之间,方言与方言之间确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然而这些同异的成分总是整合成为一个完整的自足的体系,任何方言都可以进行系统的结构分析。就语音来说,方言的语音系统之中不仅有古今音类分合和音值演变的特点,而且有声韵调组合的特定规律。最近十几年来对于方言语音系统的研究还跳出“字音”的框框,揭示了大量为了表达语义的需要而发生的音节内外的许多变声、变韵、变调的规律,至于方言的词汇和语法,也应该有自己的结构体系,只是我们至今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只要是还在社会生活中使用着的方言,不论它通行面多大,使用人口多少,它都应该作为一个结构体系来研究。对于语言来说,任何体系的研究价值都是同等的。汉语方言的研究,必须跳出寻求方言差异、概括方言特点的圈子,真正把方言作为一个结构体系来研究。

最近一二十年间的汉语方言学的研究视野确实正在逐渐地扩大着,除了注意音义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注意到方言语法的比较外,有些学者考察了方言的变异:同一个方言区里新老派的差别;有的注意到方言地区的双方言现象;有的学者探讨了方言地区的移民史和方言的形成分布的关系;有的则研究方言词语所反映的地域文化的特征。这些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是很值得鼓励的。因为汉语的方言历史长、品种多、差异大、情况十分复杂,只有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才能真正地理解汉语方言的真面貌,而多方面的成功研究一定可以为汉语语言学乃至整个语言学的研究提供宝贵的材料,成就崭新的理论。

二

那么,从“历史比较”走出来的汉语方言学怎样才能登上自己的新台阶呢?我以为很有必要提倡对各种方言进行比较的类型学研究。

方言既然是同一语言的地域变异,既然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拿活生生的方言材料作比较,便应该是方言学的基本方法。

从历史方面说,方言是语言分化的结果,不同时期所形成的方言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不同时代的语言结构特点,因此不同地域的方言差异往往是不同历史时代语言演变

的折射。因此,只要把许多方言都作了比较,人们就一定可获得丰富的语言史知识。“礼之失求诸野”,汉语方言比较研究成绩越好,汉语史的结论就越有说服力。可见,真正的历史比较也不是拿方言和中古音、中古汉语作比较,而应该是就多种方言作比较。

从共时方面说,方言不但受到共同语的一定制约,而且总要和周边方言发生相互的交流。交流越多,彼此间就有越多的类同。拿邻近的方言作比较,我们便可以了解它们之间的这种渗透关系,探寻方言间相互影响的规律,也才能理解许多方言特点的来龙去脉。

从整个汉语来说,对现代方言所作的比较研究越多,我们对古今汉语发展的历史规律及现代汉语共时结构规律的认识应越接近事实。试想想,关于汉语史的叙述如果未能解释已知的方言事实,关于现代汉语的结构体系的描述,如果未能涵盖已知的方言事实(例如说“广韵的一等韵不可以有齐齿呼的读法”,说“现代汉语只有*i*、*u*、*y*可以当韵头”这就都已管不住方言事实),这样的理论研究还有什么可取的呢?就这一点而言,方言的比较研究不光是方言学的事,也是把整个汉语语言学的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的关键。

汉语方言材料浩如烟海,全面系统地进行具体字音、词汇的比较不但是办不到的,也未必能够达到揭示汉语的演变规律和结构规律的目的。字音对照表、词汇对照表是可贵的基础资料,有了它,学者可以看到多种方言在一个共同的平面上的概貌,从中发现进一步比较研究的题目。愿意花时间编制出材料可靠的此类对照表,是值得人们敬佩的,然而如果选点欠妥,条目不当,材料不详,这种对照表也可能使人误入歧途。为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使方言比较研究更快见效,我主张选择若干要项进行类型比较。前几年关于连读变调的调查和比较以及反复问句的比较研究,就正是这类富于启发性的类型比较研究,并已经为我们创造了很好的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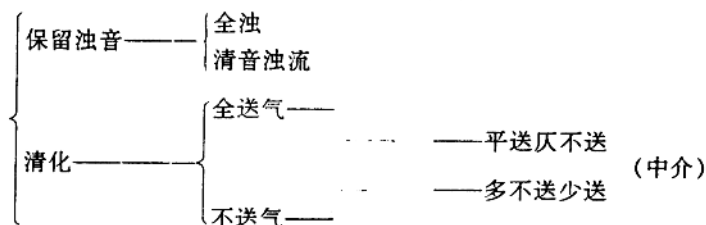
顾名思义,类型学研究着眼于类型。当然,在不同的类型中也要注意不同的数量分布,从而看出不同类型的主次轻重来,但更重要的是把类型差别视为质的差异,对于不同类型的现象要尽力发掘,力求不遗漏。可以说类型学的方法是一种以简驭繁的方法。这种方法对材料繁多的汉语特别重要,特别有效。当然,如果我们对汉语方言还知之甚少,类型学研究是无从谈起的,勉强地说则难免挂一漏万。但是,如果我们已经发掘了不少的材料,而不及及时地转入类型研究,我们就会止步不前,重复简单的劳动。现在来提倡类型研究是必要的,适时的。

比较项目的选取是类型研究成败的关键。选取比较的项目既要符合学科理论框架和方法论的要求,也要运用已有材料作分析,如果已有材料不足,则还必须进行适当的抽样调查。例如句子诸成分的语序是汉语语法的敏感地带,其中动词同时带有宾语和补语的否定式,在不同方言中就发现有多种语序:找不到他/找他不到/找不他到,这就可以作为一个比较的项目。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层次上,为了说明不同的问题,比较项目可大可小。例如有无全浊声母是一种比较,可以从中看到不同方言声母系统的大格局。全浊塞音清化之后读为送气或不送气,全浊擦音清化后读不读塞擦音,也都是一种比较,是分项的比较。

比较不同的方言事实,最重要是划分类型。从不同的语言事实归纳出不同的类型,这就是研究工作的一大突破。因为它把无序的堆砌变成有序的排列,使平面的罗列变成两

极的对照,在两极之间还显示了不同的层次。例如“找不到他”等不同说法就可以分出先宾后补和先补后宾两种类型。分出否定词和补语是分离的还是连用的两种类型。

划分类型时必须尽量采取二分法,找到对立的两极,往往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因为任何事物都是“相反相成”的。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两极之外,还有各种中介现象,在一个大的类型之中可能还有小的类型差异,因而实际上的类型往往又是多样的。平面地列举多样的类型和找出两极后为各种中介定位,这是两种不同深度的认识。例如对于古全浊塞音今读,可以平面地罗列出各种情况:全读浊音(老湘语)、清音浊流(吴语)、全读送气清音(客、赣语)、全读不送气清音(新湘语)、多不送气、少送气(闽、徽语)、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官话)、平声和部分上声字送气、去入不送气(粤语),这样的类型归纳还只是初级的归纳,还是无序的排列。采用二分法可以作如下排列:



这样的有序排列不但可以看出纵向的流向,而且可以看出横向的亲疏。

下文试罗列几种汉语方言类型比较研究的项目,据所知的部分方言事实作些说明,希望收到抛砖引玉之效。本文所用材料除本人调查之外,还参考了其他学者提到的材料,因未详加罗列一概未注明出处。

三

先讨论各方言的共时结构类型。

就语音系统的构成说,各方言的声韵调分类的多少有很大的差别。从中就可分出许多不同的类型。例如:

声母类别的多少,显然可分为多声型和少声型。保留浊音声母的吴方言和湘方言声母都在28个以上,属多声型,浊音清化而无翘舌音的闽、粤、客、赣诸方言声母通常在15—17个之间(粤方言的j、w、θ和客赣方言的ŋ-之间均无音位对立),其他北方方言介于二者之间。

韵母类别多少也有对立的两极,保留多种阳声韵、入声韵尾的闽粤客赣等方言通常有60—80甚至更多的韵类,而鼻音尾合并、塞音尾脱落的南方方言韵类最少,通常在35个左右(如温州、双峰、建瓯),北方话加上儿化韵,韵类介于二者之间。

声调的类别闽、粤、吴方言最多,7—10,以7、8居多,是为多调型;官话区最少,3—5,以4为常,是为少调型;湘、客赣介于二者之间,一般是6—7调。

3.2并不是所有声、韵、调类都可以组合成音节。在声韵调的配搭关系中有自由型和

限制型之别。自由型的全方位的配搭组合往往是因为声韵调类别较少,语音演变中有几个不同历史层次的成分并存(叠置)于共时系统之中,最典型的是闽北方言建瓯话,15个声母,34个韵母,6个声调,组成音节时不能搭配的空格很少,唇音声母可配合口呼、撮口呼韵母(例如:分 puin¹,斧 py³);舌尖音声母也可拼齐撮呼韵母(例如:除 ty³,钱 tsiŋ⁵);鼻韵尾字可出现在入声调(例如:蛋 taŋ⁷,这_{调读} ioŋ⁷,鬻 tsiɑŋ⁸,状 tsɑŋ⁸)。限制型的往往出现在声韵调类别多或语音历史层次较少的方言,如带塞音韵尾字一般都只见于入声韵(吴、闽、客赣诸方言如此),浊声母字通常只见于阳调类(吴、湘方言如此),而有 ts、tɕ 对立的总是 ts 拼开合呼韵,tɕ 拼齐撮呼韵(官话如此)。

近十几年来许多方言工作者总结出来的方言变声、变韵和变调等现象反映了方言结构体系的总体特征,表现了不同方言之间的重要差异,也是进行方言类型研究的重要课题。

两汉以来,联合、偏正、动宾、述补等双音合成词成为主流,不论是共同语或方言,双音词的比例越来越大。变声、变韵、变调等连读音变首先正是在双音词里产生的。正是适应着两个以上的语素意义凝固成一个整体概念的需要,几个音节之间发生了连读音变,把几个音节胶合成一个完整的音组。变声、变韵、变调、轻声、儿化都是这种反映语义整合的语音的胶着。然而在这点上,不同的方言的表现是很不相同的,胶合的程度不同,胶合的方法各异。就胶合程度的不同说,可以归纳为聚合型和离散型。像多数客家话和粤方言,多音连读后声韵调变得很少,是为离散型;像福州话,变声、变韵、变调兼而有之,吴方言的变调规律十分繁复,是为聚合型。就胶合的方式说,北方方言多轻声儿化,变调较为简单,湘赣方言多轻声,少变调,不同方言各有不同的表现。

从词的构成说,汉语方言中有的富于各种词形变化,例如重叠式、半重叠式、附加式(前缀、中缀、后缀),以及由实词虚化而来的粘着的词尾(或称助词)。借用语法的术语说,这类方言可称为粘着型。另一些方言则缺乏这些变化,是为孤立型。

相对而言,北方方言属于粘着型,各种重叠式普遍存在:爷爷、个个、头头、好好、怪怪、说说、想一想、想了想、常常、高兴高兴、软绵绵、团团转、稀里糊涂;晋方言还有桌桌、钱钱、豆角角、汤盅盅、牛牛车、绳绳索索等说法。北方话词尾子、儿、头、的(的字结构里)用得十分广泛,晋方言则有常用的词头“圪”(圪台、圪团子、圪吵、铁圪蛋、圪腻、圪吱、圪抽圪扯、水圪泡泡、圪等、圪爬等等)。此外北方话还普遍有虚化的词尾(或称助词)的、地、得、着、了、过等。相当于普通话的时态助词,在一些南方方言里不论是吴语的“脱”、赣语的“呱哒”或客家话“稳”、闽语的“着”,意义还没有完全虚化,结构上也不太粘着。功能上并非专用,语音也未必读为轻声。

有些南方方言在局部范围内也有表现为“粘着”的。例如闽语福州话的动词有不少准重叠式:嘟噜(悬挂)、扒啦(扒动)、基较基噜较(胡较一气)。但从总体上说,东南方言是相对“孤立的”。

在方言语音发展的过程中,不同时期的共同语都会对方言施加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这个影响的不同,方言语音的共时体系也有明显的类型差异:有的方言有系统的文白异读,反映了多种不同历史层次的语音的叠置,可以称为叠置型;有的则是个别字的读音不

合一般对应,可以称为变读型。闽方言普遍存在着文白两个系统的字音对立,是叠置型的典型,其他一些方言只有局部的字音变读。例如非组字读音在客家则只有局部字有文白 f-p、ph 的对应(癩、肥、扶、分),又如见系二等字在吴语较多的字有 k、kh、h-te、teh、e 的文白对应,(家、教、觉、敲、虾、夹、恰、江、讲、取、闲)在北方话里就只有个别字的反映(如地名中刘家庄的家白读 ka)。

在方言词汇的共时系统中,有些方言含有“底层词”、外来词、邻近方言的借用和大量的套用共同语的语词。凡是方言词中各类外来影响少的可称单纯型,外来影响多的则是驳杂型。南方方言中“底层”成分和外来词(英语借词)粤方言最多,这是一种驳杂;沿着长江的吴、赣、湘诸方言点接收了大量官话词语而放弃固有的方言说法(如不说“渠”而说“他”,不说“倚”而说“立”、“站”;不说“着”而说“穿”),这是另一种驳杂。某些内向型的中心城市(如福州)或与外地交往不多的乡间(如闽北、赣东、浙南)方言词汇则比较稳定,不易接受外来影响,因而呈现单纯型的词汇特征。

四

本节讨论各方言的历时演变类型。

关于方言语音在历时演变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演变的方向可以按声韵调各方面分项区分类型。

就浊音声母的演变说,有清音型和浊音型。如所周知,老湘语和吴语是浊音型,大多数北方话是清音型,不但全浊声母清化了,连次浊声母(微、疑、云、以及日母部分字)也清化为零声母。闽粤客赣诸方言全浊清化,次浊仍多读浊音(例如闽粤语微母字读 m-, 疑母字读 ŋ-, 客赣语微、云母字读 v-, 疑、日母字读 -ŋ、-ŋ);闽语福州话在连续变声中清音浊化的新趋向,即除首音节外,后置音节的清声母大多变成了相应的浊声母(例如头先方才 tha leiŋ, 旧底以前 ku le)。

就声母发音方法说,各方言有塞音化和塞擦音化两种类型。湘赣方言的一些点把不少知章精组字都读 t、th 声母(例如双峰粥 tiu, 张 tuŋ, 南城竹、粥 tu? 杂、察 thai?),这是塞音型;北方方言、吴方言见系声母顎化, k→tɕ, 是塞擦音型。

韵母的元音组合有单元音化和复元音化两种类型。多种高元音(i、u、y 及至)充当韵头韵尾,构成了复元音型,大多数北方话属于此型,单元音型的方言或合并、脱落韵头,如湘、赣、客、粤诸方言(长沙:岁 sei 顿 tən, 双峰:光 koŋ;广州:端 tyn, 快 fai, 赶 kən, 翁源:乖挂 kai, 官关 kan, 括刮 kat);或脱落韵尾,如吴方言等(矮、快、招、要苏州 æ、khua、tsaæ、iæ, 温州:a、kha、tɕie、ie)。

古代汉语带鼻音韵尾的阳声韵和带塞音韵尾的入声韵有强化、弱化两种类型。强化型基本保留古音的格局,有 -m、-n、-ŋ、-p、-t、-k 等韵尾,如客方言、粤方言。弱化型又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合并简化,如官话 -m 并入 -n;吴方言、闽东方言 -p、-t、-k 并为 -ʔ。另一种弱化为鼻音尾和塞音尾的脱落。吴语、徽语的古阳声韵走的是经鼻

化而脱落的路，闽南方言、闽西赣南客家话、部分湘方言也有阳声韵读为鼻化韵的现象；官话、徽语、湘语则普遍把古塞音韵尾脱落，是入声韵尾弱化消失的典型。

至于古今声调的演变，则有简化型和繁化型两种。官话调类多为四个或不到四个，属简化型，晋语及诸南方方言保留入声调的方言调类都在五个以上，多数按古清浊分为阴阳两类声调，赣方言里有按送气不送气分调，粤方言还有按元音长短分调的，其调类多达9—10个，是繁化的典型。

说汉语词汇的演变古时候单音词多，现代则双音、多音的越来越多，这大概不会有人反对。就现代汉语诸方言说，有的单音词多，有的单音词较少，姑且称之为单音型和多音型之别。

缺乏词头词尾的方言单音词就比词头词尾多样化的方言多。例如姑、姨、叔、侄、被、帐、衫、裤、柿、茄、蜂、兔、房、桌等官话区一般都不单说，而在许多南方方言里都可单说。

方言词保留古代汉语的说法的也有不少是单音词，在其他方言里往往已演变为复音词。例如知(道)、(甘)蔗、尾(巴)、嘴(巴)、(脚)爪、咳(嗽)、(脸)面、味(道)、(气)味、(颜)色、目、眼(睛)、窗(户)、(蚂)蚁、(禾)苗、藻(浮萍)、秆(稻草)、衣(胎盘)、橇(楔子)、过、惹(传染)、惊(害怕)、鼎(铁锅)、索(绳子)、粟(稻谷)、饮(饭汤)、箸(筷子)、砵(陶瓷)、口(口水)。

早年，创新的方言词也有不少是单音的，例如团(儿子)、女(女儿)、𦉳、毛(东西)、𦉳(舌头)、靓(漂亮)、肋(能干)。

关于语法，上文提过的粘着型和孤立型的对立从历时的角度看也是不同历史阶段的产物，词头、词尾、助词等粘着型的构词形式，一般认为是宋元以来的近代汉语逐渐产生的。

在句法方面，如所周知，词序是汉语句法的重要区别手段。桥本万太郎教授曾指出，南方方言有不少谓词短语的“顺行结构”的句型，北方方言则更多是“逆行结构”，他又指出了名词短语的修饰语有前置后置两种类型，把这二者联系起来可以区分出偏正型和后补两种类型。

就谓词短语的语序来说，官话属于偏正型，如把他骗了/他先走/快点儿说，把宾语或补语提到动词之前作为动词的修饰成分；南方方言则通常说：骗了他/他走先/说快点儿，把修饰成分置于动词之后作为宾语或补语。桥本万太郎还论证了后补型(顺行结构)是古代汉语传下来的(霜叶红于二月花，劳力者治于人)，偏正型(逆行结构)则是后起的现象。

名词性短语官话也属偏正型，都是古代汉语继承下来的，(客人、干菜、公猪、中国国之中、中心心中)南方方言多有后补式说法(人客、菜干、猪公)则可能是壮侗语族影响的结果。

五

以上讨论的共时结构类型和历时演变类型都是从语言内部所作的研究。除此之外，

对方言的研究还可以从外部考察方言与历史文化的关系,考察社会背景对方言差异的分布、使用和演变的制约,这类考察也同样可以看到各种明显对立的两种类型。从文化的视角考察的这些类型可以称为“文化类型”。

从现实分布的各区方言说,有的方言内部差异较小,形成中心点并对周围小方言发生深广的影响,这是向心型方言;有的方言区内部差异大,并没有形成中心,也没有具备代表性的口音,是为离心型方言。一般说来,人口密集、交通便易,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并形成了较大城市的地方,其方言往往是向心的;人口稀少的山区,交通不便,自然经济占主体,没有大城市的地方,其方言往往是离心的。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行政管辖的变化,有没有形成特有的地域文化和富于凝聚力的社会群体,也是决定方言区的向心或离心的重要因素。

粤方言是典型的向心型方言。数千万说“白话”的人都共同以广州话为标准。这种方言不但有完整的口语表达,还可以诵读书面语,写作文绉绉的唱词,还有整套文字书写体系。除广东省少数地区差异较大外,各地粤语均可通话,至于流传到东南亚、美洲的“白话”,其口音和用词的一致性,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皖南的徽语、浙江的吴语和闽中腹地的闽语都是离心型方言,这些地方都是经济较不发达的山区,缺乏大城市作为政治文化中心,未形成有代表性的方言,内部差异比较大。

有时一个方言区内部可以向心和离心的两区并存。吴语的北片是向心的,南片则是离心的,客家话南片是向心的,北片(闽西赣南)是离心的。

从社会生活中的使用的情况说,有的方言是活跃型的,有的则是萎缩型的。活跃型的方言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是全方位的,像香港的粤语甚至可以用来写小说、印书。在与其他方言共处竞争中,这种方言是强势方言,往往要扩张自己的地盘和使用,并使其他弱势方言接受自己的影响。广东省的客话区和闽语区的人都在学习使用粤方言,就是这种情况。至于与共同语的关系,活跃型方言也难免要经常套用共同语的新词术语,尤其是政治生活和科技领域的用语,但是在语音上、语法上就表现得很保守,固有的方言词也很难放弃。

萎缩型的方言是弱势方言,在社会生活的应用中呈萎缩状态。首先,在许多场合普通话普及了(例如学校、政府机关、企事业、公共场所等),方言便退缩到家庭生活和人们的个别交往的场所。例如闽北地区,城镇里已出现了不少本地人组成的“普通话家庭”(在家里也说普通话),有些青少年说不清本地话了,在农村连老年文盲也可通普通话。尚在使用方言的人则大量放弃方言词,套用普通话语词甚至夹用普通话。在与强势方言并用或交往时弱势方言往往让位给强势方言。广东境内不但在闽语、客语区的市场上充斥着“白话”,连边远的白话县份,例如云浮、封开等地本地口音也只是保留在老年人口中,年青人说的全是模仿来的说得不太标准的广州话。

像湘赣方言那样,不断放弃独特的方言成分而大量接受普通话的影响,这也是一种方言的萎缩。久而久之,所谓的“新湘语”和湘人所说的普通话就模糊难辨、合而为一了。

纵向地考察方言的演变,可以看到稳固型和变异型之别。稳固型方言不但古今变化慢,继承前代语言成分多,历来受共同语或其他方言的渗透也少;变异型方言则固守少、创